

中国能赢

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

宋鲁郑◎著



什么是理想的制度？西方从柏拉图起就有论述，他推崇的是混合政体。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提出贵族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体形式，称之为“共和政体”。历史发展到今天，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混合制度：既有民主也有集权。关于制度，严复曾经说：“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是对我们的一大启示。

——宋鲁郑

解读
中国
书系

中国能赢

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

宋鲁郑◎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 / 宋鲁郑著.
-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051 - 2341 - 0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5037 号

© 宋鲁郑

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中文简体版

本版本通过法国 Garance SUN 代理

书 名 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

著 者 宋鲁郑

出品人	高海浩	选题策划	张景涛
总 监 制	徐永新	责任编辑	张景涛 张佳彬 宋晓舒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 - 64038529
E - 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 - 64024637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 - 8402661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1 - 2341 - 0	定 价	36.00 元
--------------------------------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自序

中国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崛起被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东西方关系。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希望中国按照西方模式演变，便采取了一边倒的积极支持立场。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从西方进行制度移植，而是继续走向制度创新。

为此，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之声不绝于耳，并在行动上百般阻挠。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抓住西方反恐的历史机遇，加速崛起，成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也成为世界显学。

恰在此时，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西方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中国模式的产生及其对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效用和西方模式在全球的正当性下降。东西方关系再次处于微妙的波动甚至紧张之中。这从西方媒体对中国日益突出的负面描绘中可见一斑。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中国也终于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才能够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崛起的原因，我们可以归功于对内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的全面开放，并同时抓住了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改革和调整，在权力交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

度模式。这种特色与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不堪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世界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地运转，不仅要具有灵活性，还要具有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阿拉伯世界虽然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必然走向僵化。

中国虽然重新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但不容否认，也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为复杂、内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设最为欠缺的大国。这都是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挑战和目标。不过，当西方创造的鼓励物质享受的现代化模式，无法解决其带来的众多严重问题（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威胁和传统文明消失等）时，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中庸”等理念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解决方案。所以，面对中国再度崛起，我们自豪，但是更要清醒。

制度的优劣因不同的社会环境而相异。西方走在了现代文明的前列，有其制度因素。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也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现在我们正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制度充满信心。

对于中国崛起，海外华人的感受最为直接和强烈，对西方的不公正评价更是如鲠在喉，于是不平则鸣就成了他们的选择。由于他们对东西方均十分了解，从比较和发展的角度落笔，犹如庖丁解牛，切中要害。我在法国生活多年，投笔于此，也算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东西方对比，在不同的国情和环境下，中国的制度模式在很多方面占有优势，请走进此书，一窥究竟吧！

宋鲁郑

2012年9月于法国巴黎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篇 中国为什么能赢

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3
全球坐标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9
中国模式终结西方民主一元化时代	13
民主困境与中国模式开创第三条道路	16
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一枝独秀	19
中国何以不会发生美国式金融危机	23
转型期中国为什么能保持稳定	25
中国崛起何以如此不同凡响	29
印度凭什么赶上中国	31
明治维新误读与中国曲折复兴	39
中国何以成为硕果仅存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42
在法国体味中国崛起	45
中国模式创造人类史上最大奇迹	48

第二篇 西方民主的真相

西方对华出牌何以总是适得其反	57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与西方民主的失败	60
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	64
中国为什么要反对西方的新闻自由	78
西方还是原来的民主吗	98
英国“窃听门”挑战普世价值	100
美国的“民主”保卫战	106
柏林墙倒塌与西方民主困境	110
德国大选背后的西方民主政治	112
西方民主何以是鸦片	117
美国为什么反对中东民主化	122
从西方宗教看西方民主	126
法国民主为何保护不了华人	128
《新闻周刊》收购战：美国为何不卖给中国	131

第三篇 西方民主的陷阱

西式民主能够化解中国的困局吗	137
发展中国家能跳出“民主陷阱”吗	149
利比亚为什么避不开“民主魔咒”	154
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160
从比利时危机看中国民主化的挑战	167
为什么不要用西方民主来定义中国模式	173
中国能渡过转型高危期吗	175
西方民主何以走向不归路	179
巴西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的启示	183
何以越民主，越腐败	188

第四篇 中西方对比与差异

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195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205
东西方模式谁主沉浮	212
法国大选对中国政改的启示	216
西方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制度危机	225
什么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229
中国是美国的救星还是灾星	232
从“神舟九号”透视当今世界	236

第一篇

中国为什么能赢

- 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 全球坐标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 中国模式终结西方民主一元化时代
- 民主困境与中国模式开创第三条道路
- 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一枝独秀
- 中国何以不会发生美国式金融危机
- 转型期中国为什么能保持稳定
- 中国崛起何以如此不同凡响
- 印度凭什么赶上中国
- 明治维新误读与中国曲折复兴
- 中国何以成为硕果仅存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 在法国体味中国崛起
- 中国模式创造人类史上最大奇迹

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也必然体现在制度竞争的结果之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的成功决定了中国再度复兴。

中国在世界范围的落后和挨打，始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尽管中国后来进行了洋务运动，却惨败于小国日本，旧的东亚体系全面崩溃，随后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之间矛盾重重，中国早已被彻底瓜分（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大学课堂上的讨论题目之一便是：是否应该瓜分中国）。昔日中国之失败显然在于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是制度之败。

后来，曾在美国生活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以美国为范本重建中国的制度，并最终于 1911 年取得成功，终结了晚清 70 年的屈辱历史。然而，在中华民国 38 年间，别说中国再度复兴，甚至连国家统一、主权独立的历史任务都没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着 1840 年以来的下滑轨道加速沉沦：国家进一步分裂，国力进一步衰微。其实，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民国元老章太炎就公开提出“民国亡国论”，实是远见卓识、振聋发聩。袁世凯称帝固然有其权力私心，但中华民国体制不适合中国也是其理由之一。张勋复辟固然和他个人对清王朝的愚忠有关，但同样也是中华民国的失败造成的。因此，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经走过一个甲子，中国在重新赢得独立和主权之后，也再度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

大的国家。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从1978年的2.3%上升到19.2%，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位居世界第一。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早已超过“金融帝国”——美国，在全球市值十大银行榜上，中资银行已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银行4家。中国汽车销售量也超过“汽车王国”——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倍；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增长了1万多倍；贸易总量增长2200多倍，跃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则增加1000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长了两倍（从4.5亿到13亿）的情况下，超过3000美元，增长133倍。

不仅经济如此，社会发展也是成果惊人：文盲率从80%降至3.6%，人均寿命由不足35岁增至73岁；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51.27%，是全球城镇化速度的两倍。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源于制度成功，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这一点，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已故知名宪政学者蔡定剑教授这样评价一种制度：“国际上的投资，大的资本的投资，人家要选择投资环境，不会选择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国家去投资。”虽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时说这番话的，但这句话也是对一国制度模式是否有效的检验标准。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全球五百强绝大多数在中国投资设厂。显然，全球商业用资本对中国的制度投了赞成票。不过，考虑到在中国的投资大多是周期长、流动性差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在美国更多是短期、风险性高、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全球商业资本对哪一个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笔者看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在于其超强的纠错能力。中国高层的决策素来以高效著称，但纠错的能力和效率往往被人所忽

视。新中国六十年，最大的失误有两点：三年灾荒，十年“文革”。中国在纠正这些错误时，一是时间短，分别为三年和十年；二是善于进行自我纠错。这一点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显。美国独立后以立宪的方式实行黑奴制长达百年；废除黑奴制后，又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长达百年。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与终止，也并非自我纠错。黑奴制的结束是通过一场代价极高而且惨烈的内战，北方对南方在战争期间甚至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焦土政策；而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则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抗争方式下才获得的，这期间惨烈的暴动曾震撼全球。

其实，东西方不仅制度性的纠错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就是政策性的纠错能力也存在天壤之别。中国错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从而导致人口增长失控。但中国意识到错误后，立即实行计划生育，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虽然也意识到人口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曾尝试计划生育政策，但屡屡失败。印度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制度——任何政党想推进计划生育，都会在大选中败北。因此，印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口暴涨，并将快速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正如西方所说，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越中国的地方。还有，当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放弃计划经济时，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印度在中国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功后，才于20世纪9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比中国落后了十多年，这在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时代意味着什么，那就不言而喻了。

美国的次贷危机，几年前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但并没有采取相关措施。危机爆发后，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这样辩解：不错，我是几年前就知道次贷的危害，可是如果我把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国会会批准吗？一语道出美国何以失去纠错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国的次贷危机，以“两房”（房利美、房地美）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二十多年前就被美国学者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经济学

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两大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但毫无实权的委员会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2007年,这位学者仍在撰文呼吁“两房”的问题,期望借此警示世人,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的全面爆发。可以说,西方的制度模式缺少高效的纠错能力,错误只有等到危机爆发才有可能解决。

如果东西方制度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制度至少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

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德国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近几十年数位总统都想将之建立,但都以失败告终。奥巴马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势力求成功,声称为了医改,他宁可放弃连任,他在国会演讲也毫无退路地表示自己将是最后一位医改闯关总统。然而,既得利益者却发起了强大的反扑,并给他扣上要把美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帽子。

至于法国,类似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宪法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全民公投“拒绝”。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之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任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屡次在危机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在一次事关改革的公投中败北,从而辞去总统职务,彻底离开政坛。当

然，对于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从制度上进行修补。比如，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后，法国新政府就不再通过公投方式进行表决，而是直接在议会表决通过。

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西方号称“民主”和“三权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选举产生，二是采用终身制。原因在于，不是选举产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还是要摆脱民意的制约。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当民意走向极端时，仍然于事无补。

希拉克时代的德维尔潘政府，为解决就业难题，推出 CPE 法案，以帮助青年人就业（由于法国当前的劳动法规定，企业雇主不得随意解雇职工，对雇主解雇职工设置了种种苛刻条件，因此老板大多不愿也不敢轻易雇人。青年人就业相当困难。为此，该法案决定赋予雇主一些随意解雇员工的自由）。这样一个改革幅度不大、针对面也不广的法案却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议会通过，总统签署，已成为法律，但民众发起了长期的大规模罢工、游行，最终迫使这项法律作废。这就是“广场政治”的效应。

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总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可选民只会看自己，但国家要看是否整体上有利。这就是票选民主的致命伤。这就是美国宁可通用公司破产，鱼死网破，也不同意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共渡难关的原因。

西方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人性恶的认知上。但这套制度在遏制执政者的“人性恶”的时候，却忽视了民众的“人性恶”，表现在当下就是大众贪欲。在民主制度下，各政党为了胜选只能迎合民众。所以虽然西方提倡低碳生活，但一个美国人的消费是全球人均为的 8 倍，美国百姓习惯于借钱超前消费，这些问题在民主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这也是西方福利制度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沉重和根本无法改变的原因。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高福利必然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和普遍浪费与低效率，这反过来又危及民主的存续。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西方的民主选举，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别看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只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

这也是为什么 2008 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这也是美国产生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

之前倒闭的美能源巨擘安然公司，是小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 位参议员和 187 位众议员曾收受过安然公司的政治资助，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得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这也是曾任美国纳斯达克主席的投资大亨马多夫为什么能够在美国行骗多年、撑起一个 500 亿美元的骗局。甚至他自己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资本的力量在中国虽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于政治权力之下；一旦资本逐利本性恶性发展，政治权力便可以迅速解决。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尽管企业妄图掩盖真相，但在最高政治权力面前被彻底粉碎。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必将会是第二个“两房”。

中国的现行制度如何，从自身取得的成就，从纵向与清朝、民国相比，从横向与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因此，可以说制度的成功，才创造了“中国复兴”（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后再度复兴）的奇迹。

全球坐标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以一流的硬件、一流的服务、一流的表现，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一流中国”的形象；北京奥运会后不久，中国接连发生“山西溃坝”、“三鹿奶粉”两起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再现了中国“第三世界”的另一面。

看到“一流中国”的西方人士，不免会得出“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模式”；而看到“第三世界”一面的人，则会得出“中国崩溃论”。而一流和三流交织在一起，甚至一流里面也有三流的暗点，比如形同虚设的京奥示威公园；而三流的一面也有一流的闪光点，比如对事件的迅速处理、新闻公开和高官问责制，而这就是中国的真实发展现状。

如果说“一流”表现了中国体制的优势，“三流”则体现了中国体制的弊端。“山西溃坝”与“三鹿奶粉”有一个共同的深层根源：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且日益崛起的资本力量。中国已出现了由改革开放前主导社会的单一政治力量逐渐向资本与政治权力共同谋求发展的变化。然而，崛起的资本不会追求民主，追求法制，而只会追求更多更高的利润。为此，资本力量不惜收买媒体、官商勾结，寻求体制内的代言人。如果放眼全球，这是资本的共性。

即使在今天，众多跨国企业为回避本国的工会、劳动法规、健全的福利制度、高昂的环保成本，而纷纷向新兴国家包括中国转移。而这些在本国并不合法的行为由于出现在第三国，而且又能给本国带来高额利润，这些跨国企业的母国并不追究。这种逻辑好比说：你在美国违法是不行的，但在其他国家就可放任自流了。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三十年转轨之路也到了中途。根据历史的经验，这是社会矛盾最为尖锐、最为突出的一个时期。而此时，面对资本的强势崛起并展现出赤裸裸地追求利润而且不择手